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52

2008年7月15日

\*\*\*\*\*

## 毛澤東人口思想研究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梁中堂

毛澤東人口思想是毛澤東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理論和觀點的概括。近現代以來，任何尋求有關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途徑，都離不開如何認識中國社會性質、中國向何處去以及如何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和中國如何發展等基本問題。所以，毛澤東人口思想首先是作為一種歷史觀出現的，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問題的實踐過程中產生的。毛澤東人口思想具有十分豐富的內容，是毛澤東思想整體不可分割的部分。毛澤東思想是馬克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研究和理解毛澤東人口思想，既不能與毛澤東思想整體割裂開來，也不能離開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探索的具體歷史背景。由於歷史發展的原因，我們過去對毛澤東人口思想的學習和認識，一方面要受到對毛澤東思想整體的評價和認識的局限，另一方面往往只能接觸到毛澤東人口思想的一些孤立的話語片段而不得不語錄式地學習，所以對其整體的研究和認識都是很不夠的。近十幾年來，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的鉅大發展，人們對新中國自己的歷史和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都更為客觀和深入了，相繼產生了一大批研究毛澤東歷史和毛澤東思想的新成果。特別是一些毛澤東的文稿、文集和有關毛澤東的一些文獻的相繼出版，再現出

許多過去無法瞭解的歷史情節，使得我們有了一定的條件能夠回到具體的歷史中去研究毛澤東人口思想。

## 一、在革命實踐中獲得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

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就十分注意和重視人口問題。毛澤東起草的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期的紅色根據地的許多政策性文件和其他各類文獻，都有對人口狀況進行具體的分析。<sup>1</sup> 這一時期的毛澤東十分重視農村調查，先後進行了尋烏、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等一些比較系統的調查。譬如在尋烏的調查中就有“人口的成分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農村人口成分”等方面的內容。<sup>2</sup> 在〈長岡鄉調查〉中，首先就向讀者交代了該鄉的“政治區劃和戶口”。<sup>3</sup> 1931 年，毛澤東起草文件通知，要求紅軍各政治部、地方各級政府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sup>4</sup> 在長期革命鬥爭中，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和分析問題，寫下許多不朽的論著，其中也包括運用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形成的論著，如 1926 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7 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33 年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1939 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論〉、1949 年的〈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等，<sup>5</sup> 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但是，一直到中國革命即將在全國範圍取得勝利的幾十年裡，則很少有能夠全面反映毛澤東人口思想的文獻。1949 年 8 月，美國政府面臨其

<sup>1</sup> 譬如，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 年 12 月），其中有對婦女和青年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的數據說明（〈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98、99 頁）。

<sup>2</sup> 〈尋烏調查〉（1930 年 5 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 169、173 頁。

<sup>3</sup> 〈長岡鄉調查〉（1933 年 11 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 277 頁。

<sup>4</sup> 〈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1931 年 4 月 2 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12 頁。

<sup>5</sup>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 年 3 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1 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 年 3 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怎樣分析農村階級〉（1933 年 10 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 年 12 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新民主主義論〉（1940 年 1 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對華政策的失敗，需要回答反對黨的指責，從而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這兩個文件，披露了一些過去難以見到的內幕材料。毛澤東抓住機遇，連續發表了五篇評論文章。<sup>6</sup> 尤其最後一篇〈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以歷史唯物論觀點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必然性以及最終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由於美國政府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用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觀點闡釋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發展問題，這就為毛澤東提供了全面闡述自己人口思想的機會。

艾奇遜在給杜魯門的信中說，中國人口在 18、19 兩個世紀裡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sup>7</sup>

按照艾奇遜的觀點，中國人口太多了，飯少了，所以發生革命。過去政府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一定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根據艾奇遜這一觀點和邏輯，中國已有四、五億的人口，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誰也無法解決的吃飯問題決定了中國要繼續發生戰爭，繼續亂下去。這是赤裸裸地搬弄馬爾薩斯主義的觀點。毛澤東用包括美國獨立戰爭等革命事件在內的大量中外歷史說明，革命爆發的原因不是人口過多，而是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接著，毛澤東反駁說：“中國人口衆多是一件大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

---

<sup>6</sup> 毛澤東的五篇文章最初是以新華社編輯部的社論形式出現的。1949 年 8 月 12 日，新華社編發了由胡喬木執筆的第一篇評論〈無可奈何的供狀〉，14 日開始分別發表毛澤東寫的〈二評白皮書〉，以及三評、四評等共計六篇評論。1960 年，由毛澤東執筆撰寫的五篇評論編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時的題目分別改為〈丟掉幻想，準備鬥爭〉（1949 年 8 月 14 日）、〈別了，司徒雷登〉（1949 年 8 月 18 日）、〈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1949 年 8 月 28 日）、〈“友誼”，還是侵略〉（1949 年 8 月 30 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1949 年 9 月 16 日）（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 年，第 548~549、551、559、561、572~573 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472~473 頁）。

<sup>7</sup>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 1514 頁。

完全駁倒。”<sup>8</sup> 毛澤東在批判中還從歷史經驗提煉出一個十分著名的命題——“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並由此寫下了一段膾炙人口的文章：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創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sup>9</sup>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的篇幅雖然不長，卻是研究和領會毛澤東人口思想的最為重要的文獻。首先，毛澤東不是通過對〈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的寫作才產生或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唯物歷史觀的人口思想，而是在這篇文章裡比較全面和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人口思想。毛澤東在早期的革命活動和革命鬥爭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指導其偉大的革命實踐中產生和形成了後來被稱之為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如果從文獻上來研究，〈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文章表明，20年代的毛澤東已經具有極為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在寫作〈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時，早已經完成了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轉變，已經是一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思想家和通過幾十年艱苦鬥爭即將在一個人口大國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嫻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歷史觀對美國政府和艾奇遜所依據的馬爾薩斯主義批判，僅僅是比較集中地體現了自己所持有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人口思想。在一定程度來說，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只是把自己已有的一些思想和觀點提煉得更為概括和精闢了，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更為通俗化了。如果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進行研究，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創新的思想並不多。

其次，與大多數人狹隘地將人口理論和人口思想簡單地歸納為主張增加或減少人口的認識不同，毛澤東十分敏銳地首先將人口思想歸結為一定的歷史觀，把造成舊中國貧窮落後和絕大多數中國人吃不飽穿不暖的原因歸結為腐朽的社會經濟制度和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把用馬爾薩斯主義解釋中國革命和人口問題的觀點歸結為唯心歷史觀。毛澤東的這一認識和觀點的重要意義在於，這是理解中國社會問題和中國人口問題的本質所在。因為，對中國革

<sup>8</sup>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515頁。

<sup>9</sup>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516頁。

命和人口問題的認識是與對中國社會問題和人口問題的性質的認識，對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道路、路線及方針、政策，都聯繫在一起的。如果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翻檢和研究人口學的歷史，人口理論從其產生以來就是要回答這一社會根本問題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既不是提倡節制生育，也不是主張減少人口的。馬爾薩斯匿名出版《人口論》的時候，僅僅是一位剛從神學院畢業的年輕神父，那時的教會都是反對節育的。馬爾薩斯在其著作中就坦率地道出了《人口論》的實質是反對社會的改革和改良。他說：“本書的目的，與其說是在提出改進社會的新計劃，不如說是在教育人們必須安於一部分早已按照自然之道在進行的改進方式，並且必須不去阻礙否則就要如此去做的進展。……具有最普通的理解力的人都能領會到由人口因素產生的下列真理：（一）貧困的主要和最難消除的原因是與政府的形式或財產的不平等分配沒有多大關係或沒有任何直接關係的；（二）因為有錢的人實在沒有能力為窮人們找到工作並維持其生活，所以，照情理說，窮人們也就沒有權利向富人們需索這些東西。十分明顯，如果下層階級的人都知道這些真理，那麼他們就會以更大的耐心來忍受他們可能遭受到的困苦，就不會由於自己的貧困而對政府和上層社會感到那麼不滿和忿恨了，在一切場合裡也不至於那麼容易擺出反抗的姿態或發生騷亂了……”<sup>10</sup> 不難理解，馬爾薩斯是在做一位神父應該做的對窮人的安撫工作。但是，貧窮仍然是那時英國的普遍現象，年輕的馬爾薩斯還不具有從歷史哲學上回答問題的能力，就把人的生育和穀物的繁殖能力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杜撰了一個人口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和穀物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兩個公理”，然後將貧窮、飢餓、瘟疫和戰爭等社會現象解釋為“自然法則”要求兩個級數保持相對平衡的手段。這就自然地將窮人的生育當作產生社會問題的替罪羊，把人口因素當作阻礙社會進步的根源，從而陷入了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窠臼。毛澤東敏銳地抓住美國政府所持的馬爾薩斯主義，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人口決定論所代表的唯心歷史觀，清晰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矛盾統一關係方面尋找人口問題根源的經濟決定論的唯物歷史觀。

第三，美國政府和艾奇遜認為，中國所以發生革命是因為人口太多和西方思想的傳入。這又是用外部因素來解釋社會歷史的轉變。馬克思批判馬爾

---

<sup>10</sup> 馬爾薩斯：《人口原理》，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550~552頁。

薩斯時就說：“馬爾薩斯撇開了人口運動的這些一定的歷史規律。這些規律由於是人類本性的歷史，所以是自然的規律，但僅僅是在一定生產力水平的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人的自然規律，而這種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則是受人類本身歷史過程制約的。”<sup>11</sup> 毛澤東堅持唯物辯證法的內因論觀點，認為中國社會發展是其自身、內在因素作用的結果，中國社會問題和人口問題的發生是中國當時的經濟社會制度落後於歷史發展的反映，解決了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制度障礙，也就解決了中國的人口問題。所以，即使馬克思主義這樣的客觀真理也是因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才起作用的。毛澤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sup>12</sup>

第四，與美國政府和艾奇遜等人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把勞動人民當作負擔、累贅、包袱的觀點相反，毛澤東十分推崇人的價值，提出了“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等思想，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於個人存在是人類歷史的前提、<sup>13</sup> 人是社會歷史的主人、<sup>14</sup> 勞動人口是一切生產力的條件等觀點，<sup>15</sup> 以及人民創造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英雄等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原理，反映了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特有的“人為貴”、“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和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宗旨。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唯物歷史觀是支配毛澤東一生的基本思想理念，也是其一生革命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又總結制定出黨的群眾路線。相信

---

<sup>11</sup> 〈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7頁。

<sup>12</sup>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519頁。

<sup>13</sup>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3頁）。

<sup>14</sup> “有了人，我們就開始有了歷史”（〈《自然辯證法》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57頁）。

<sup>15</sup> “……資本的存在所達到的規模，是以勞動人口的規模，以本身就是一切生產力的條件的大量人口為前提的”（〈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草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第285頁）。

群眾，信任群眾，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僅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實行人民戰爭取得勝利的基本法寶，也是經濟建設時期的基本工作方法。

毛澤東認為，對人的尊重、崇尚人的價值等人民性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不僅是個認識問題，而且首先是對待人、對待人民群眾的感情和態度問題。1938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將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性因素歸結到人民性方面，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毛澤東說，這不是方法問題，“是根本態度（或根本總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於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黨的一切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sup>16</sup> 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又進一步總結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sup>17</sup> 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經過抗日戰爭迅速發展壯大的根本所在。

戰爭年代如此，建設時期的毛澤東也是如此。1956年，毛澤東說：“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sup>18</sup> 毛澤東還說：“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展了，總是要革命的。生產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工具要革命，它會通過人來講話，通過勞動者來講話，破壞舊的生產關係，破壞舊的社會關係。”<sup>19</sup> “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sup>20</sup> 正是由於毛澤東基於對人、對人民的這一崇高敬仰和尊重的理念，將新取得政權的國家命名為人民共和國，政府稱之為人民政府，並為其制定了一切屬

---

<sup>16</sup> 〈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74~475頁。

<sup>17</sup> 〈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031頁。

<sup>18</sup> 〈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78頁。

<sup>19</sup>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19頁。

<sup>20</sup>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多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78頁。

於人民、一切為了人民和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sup>21</sup> 是毛澤東的認識和信仰，也是世界觀。這是理解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人口思想的鑰匙和樞紐。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毛澤東說的“中國人口衆多是一件大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既不是吹牛皮、說大話，也不是“從政治鬥爭的需要”才要說的。<sup>22</sup> 這是只有像毛澤東這樣對人民無限信仰和忠誠的人才配具有的一種世界觀和大無畏的氣概！

第五，毛澤東提出的“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集中概括和形象地表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關係的唯物歷史觀和人口理論。馬克思論述過剩人口問題時說：“社會的條件只能適應一定數量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說有一定形式的生產條件的擴展能力所設定的人口限制，隨生產條件而變化，收縮或擴大，……人口究竟能超出它的限度多少，這是由限度本身決定的，或者確切些說，是由設定這個限度的那同一個基礎決定的。”<sup>23</sup> 所以，人口的容量或人口過剩之類的問題都是相對於一定的社會制度或經濟體制而言的。毛澤東有一次解釋歷史辯證法關係時說：“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消滅了，你們講，那個時候還有沒有革命？我看還是要革命的。社會制度還要改革，還會用‘革命’這個詞。當然，那時革命的性質不同於階級鬥爭時代的革命。那個時候還有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關係搞得不對頭，就要把它推翻。上層建築（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生產關係，人民就要改革它。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展了，總是要革命的。”<sup>24</sup> 人口問題，其本質都是一定社會時期的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束縛和上層建築落後於經濟基礎的結果。堅持社會革命和推動社會改革，變革經濟制度和改善經濟政策，調整過時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上層

<sup>21</sup>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20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36頁。

<sup>22</sup> 學術界有將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毛澤東人口思想僅僅看作是毛澤東當時“從政治鬥爭的需要”講述的一些觀點（郭志儀：〈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我國五六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四期）。

<sup>23</sup> 〈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第105頁。

<sup>24</sup>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18~319頁。



建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能夠解決一定歷史階段的人口問題。這既是毛澤東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原理，也是毛澤東人口思想的理論基礎。

## 二、工業現代化建設和人民的婚育自主權利

回應西方國家工業革命和現代化的挑戰，改變舊中國落後的經濟面貌、強國富民和趕上西方發達國家，是從晚清時期開始的幾代有抱負的中國人的志願。20世紀40年代末，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的時候，像蘇聯那樣走社會主義道路，包括實行計劃經濟，推進工業化和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都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決心將中國這艘航船引向經濟、文化和政治等社會全面現代化航程的早已確定了的路線和目標，也是毛澤東認為帶領人口眾多的中國人民走上富裕之路和實踐自己歷史唯物論的人口思想的必然選擇。

新中國是在一個相當落後的基點上開始工業建設的。毛澤東曾經在一次會議上很形象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sup>25</sup> 所以，從建國後恢復國民經濟開始到制定經濟發展計劃，中央政府都把建設的重心放在建設一個比較獨立的重工業體系方面。從1950年毛澤東訪蘇確定蘇聯援助建設東北50個工業項目開始，“一五”計劃投資250億元，確定和實施的工業建設項目總計達到一萬多個，其中大中型項目921個。在中大型建設項目中，蘇聯援建156個，民主德國、捷克、匈牙利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援建項目68個。一個擁有煤炭和電力及石油等能源工業、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械製造工業、航空工業、電子工業、兵器工業、航天工業、船舶工業等現代工業體系的建設在全國大地上全面鋪開。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軍人脫下軍裝轉到了地方，年富力強的農民被招進了工廠。至於青年學生和稍有文化的知識分子，更是國家機關、企業和服務行業爭聘的對象。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很快改變了舊中國那種毫無生氣、沒有活力的社會面貌。已經脫離傳統農業的一代新人理所當然地要求和嚮往著與工業化相適應的新生活。中國農業社會創造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已經動

---

<sup>25</sup>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頁。

搖。經濟變革和包括家庭傳統婚姻制度及生育習俗在內的社會變革是這一時期新生政權必然遇到的重大課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十分自然地站在社會變革的前列，國家政權以鮮明的態度積極扶植新生事物，支持社會變革，使得一個在經濟、文化和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都非常保守的國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裡就能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展現在世界面前。

廢除舊的婚姻制度具有反封建的性質。所以，早在共產黨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開始了。1931年12月，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名義簽署的《婚姻條例》中提出，“確定婚姻以自由為原則，而廢除一切封建的包辦、強迫與買賣的婚姻制度”。<sup>26</sup> 後來的各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也都有相類似的新婚姻法規定。1950年4月，毛澤東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並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徹底廢除了舊的婚姻制度。這是新中國最早頒佈的法律法規之一。1950~1953年，毛澤東直接領導黨和政府在全國進行了一場深入持久地宣傳、貫徹和執行新婚姻法的運動，對全民族的新的自由婚姻觀的樹立和形成，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通過新婚姻法的頒佈和貫徹宣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很快都成為我國社會的新風尚。

節制生育是工業現代化的一個必然結果。建國之初，國家有關政策和法律依據傳統都是限制避孕和節育的。1950年4月由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聯合頒發的〈機關部隊婦女打胎限制辦法〉，1952年5月由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制定的〈限制節育墮胎暫行辦法〉和〈婚前健康檢查實施辦法〉，對墮胎和節育用具的使用、銷售，都有嚴格的限制規定。這些規定首先與城市青年的生活發生衝突，給城市青年的學習和工作帶來不便。所以，人民群眾紛紛給黨和政府機關反映這一問題。1954年，衛生部在〈關於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題的通報〉中就說：“本部對於節育問題，過去一直採取嚴格限制的方針，……自實施上項管制辦法以來，各地機關幹部、工廠工人以及城市市民因子女過多，影響到生活工作和學習，紛紛提出反對意見……”<sup>27</sup> 1955年2月，衛生部黨組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說：“幾年來，我們曾接到許多人民來信，其中主要是機關幹部、工礦企業的職工，他們對節育問題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認

<sup>26</sup> 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361頁。

<sup>27</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委員會編：〈關於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題的通報〉，《計劃生育文件彙編（1950~1981.3）》，第108頁（內部，未發行）。

為子女多，對工作、學習、生活以及第二代的教育均有很大困難……”<sup>28</sup>

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無法確定毛澤東和中央政府最早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回應群眾這一要求的。根據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袁安全、楊振國的文章和1955年2月中央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向黨中央的報告〉，鄧小平於1953年8月就曾指示有關部門改正禁止和限制海關進口避孕藥具的做法，督促下發〈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放寬對避孕和墮胎的限制。1954年5月27日，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又給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寫信，要求國家機關制訂辦法，幫助解決群眾的避孕問題。第二天，鄧小平即給分管衛生部的政務院秘書長兼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習仲勳批示說：“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衛生部對此似乎是不很積極的，請文委同衛生部討論一下，問問他們對此問題的意見，如他們同意，就應採取一些有效的措施。”<sup>29</sup> 這次批示很快就有了效果，7月20日，衛生部下發了經政務院批准的修訂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sup>30</sup> 11月10日，衛生部又下達了〈關於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題的通報〉。該通報“擬訂改進辦法”，提出“避孕節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請求避孕者，醫療衛生機關應予以正確的節育指導。”“一切避孕用具和藥品均可以在市場銷售，不加限制。”<sup>31</sup>

1954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召集國務院第二（文教）辦公室、衛生部、輕工業部、商業部、中央宣傳部、全國婦聯等單位負責人座談節制生育問題。劉少奇說：

關於節育問題，我們黨、我們的衛生機關和宣傳機關，是提倡還是反對？有些人是反對的，有的人還寫了反對文章。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

<sup>28</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計劃生育文件彙編（1950~1981.3）》，第2頁。

<sup>29</sup> 彭珮雲主編：〈鄧小平對鄧穎超來信的批示（1954年5月28日）〉，《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46頁。

<sup>30</sup> 彭珮雲主編：〈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2頁。

<sup>31</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委員會：〈關於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題的通報〉，《計劃生育文件彙編》（1950~1981.3），第108頁。

避孕藥品與器具的供應，不要從商業問題上著眼，這是個人民需要的帶政策性的問題。商業部門和生產部門都要努力供應，力求滿足，盡可能做好。<sup>32</sup>

劉少奇主持的這次座談會，極大地推動了節制生育活動在全國的開展。1955年2月，衛生部黨組向中央遞交了〈關於節制生育問題向黨中央的報告〉。報告中檢討了衛生部以前對節制生育問題的消極態度，提出了整改的意見和辦法。3月1日，中央對該報告作了重要批示。這是迄今發現的我們黨和國家同意和提倡節制生育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中央在批示中說：

節制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爲了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們黨是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的。各地黨委應在幹部和人民群眾中（少數民族地區除外），適當地宣傳黨的這項政策，使人民群眾對節制生育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sup>33</sup>

1956年8月，衛生部的〈關於避孕工作的指示〉不僅對於黨和政府支持群眾避孕和節育的目的講得更爲清楚，而且進一步指出“避孕是人民民主權利，應由人民自由使用”，並規定了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責任和義務。<sup>34</sup>

我們還缺少1956年以前，毛澤東對待避孕和節育問題的具體意見。但是，據記載，早在1954年，鄧小平就向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賀誠和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徐運北傳達過毛澤東有關於節制生育的指示。<sup>35</sup> 如果這一記載屬實，熟悉毛澤東早期領導下的黨和國家的工作規則的人都知道，沒有毛澤東的同意，即使毛澤東對節育問題曾經有所表示，那也是不得隨意向下傳達與擴散的。鄧小平的傳達，表明毛澤東早在此之前已經對節育問題有了肯定和支持的明確意見。其次，從這一時期衛生部和其他國家機關對節育態度的轉變以及相關活動的安排，可以推測毛澤東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和作用。按照黨的紀律，凡屬中央日常工作和一些重大問題的處理，都須經過毛澤東的批准同

---

<sup>32</sup> 〈提倡節育〉，《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173頁。

<sup>33</sup> 彭珮雲主編：〈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頁。

<sup>34</sup> 彭珮雲主編：〈關於避孕工作的指示〉，《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891頁。

<sup>35</sup> 彭珮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紀事〉，《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406頁。

意。<sup>36</sup> 所以，根據劉少奇在座談會上說“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判斷，這一肯定性的意見應該是由毛澤東決定並代表毛澤東的。而且，這次涉及中央許多機關和部門參加的節制生育工作座談會，很可能就是由毛澤東決定並委託劉少奇主持召開的。倘若再推而廣之，如果不是得到毛澤東的意見，尚未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也不會接二連三和如此執著地要求並不由他分管的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改正原先對節育和避孕所作的限制規定。同樣，按照這一邏輯推論，我們至少可以把中共中央 1954 年 3 月 1 日關於節制生育的批示，直接當作毛澤東的意見。

由於毛澤東領導下的黨和政府的推動，那些在西方國家的民衆需要經過長期鬥爭才能爭取到的婚姻自主和有關避孕與節育自由的民主權利，新中國之後不久我們國家都順利地實現了。從 1954 年開始，全國各大城市已經廣泛開展了節制生育和避孕方法的宣傳。1955 年，衛生部在北京舉辦的一次關於避孕的宣傳報告會，發出七百張聽講票，竟有兩千人到場。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避孕常識》，不到一年的時間，在北京、重慶九次印刷，銷售 102 萬冊。<sup>37</sup> 1956 年 10 月，地處西部的西寧市舉辦過兩次節育、避孕的知識展覽，參觀者 2.75 萬人次，印發宣傳材料五千多冊。據青海省醫藥公司統計，該年全省出售避孕套 76233 個，避孕帽 2141 個，避孕栓 2252 盒，避孕膏 3372 支。<sup>38</sup> 也是在這一年，江蘇和廣州、天津等地開始生產避孕藥具。

### 三、從“革命加生產”到“不斷革命”和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馬克思說：“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過程。”<sup>39</sup> 所以，凡是遵

<sup>36</sup> 1953 年 5 月 19 日，毛澤東曾就嚴格執行這一紀律兩次寫信和批示劉少奇、楊尚昆等人。“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需經我看後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關於用中央名義發文件、電報問題的信和批語〉（1953 年 5 月 19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0 年，第 229、230 頁；《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80 頁）。原文“否則無效”四個字下用黑點標示。

<sup>37</sup> 〈進行避孕知識的宣傳和指導〉，《健康報》1956 年 6 月 15 日。

<sup>38</sup> 《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86）》，人民衛生出版社 1987 年，第 112、250、257、183~184 頁。

<sup>39</sup> 〈《資本論》第一版序言〉，《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12 頁。

循和順應社會發展自然過程的革命、改革和改良，就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社會進步和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澤東的“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十分形象地概括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歷史觀的人口理論。新中國建立後，1950~1957年，全國社會總產值由683億元增長到1606億元，七年增長2.4倍；其中工農業總產值由575億元增長到1241億元，增長2.2倍。<sup>40</sup> 1950~1956年，按照全部人口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由78元提高到142元，平均每年增長10.5%。<sup>41</sup> 如果以1952年居民消費水平為100，到1956年，全國居民消費水平達到124.5，其中農村居民為116.7，城市居民為131.8。<sup>42</sup> 這樣的增長和提高水平，在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但是，真理都是有條件的。毛澤東過於相信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提出“不斷革命論”，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搞經濟建設。1958年1月，毛澤東在一個文件中說：

不斷革命。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從1949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接著又是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再過五年，就可以比較主動一些了；十年後將會更加主動一些；15年後，糧食多了，鋼鐵多了，我們的主動就更多了。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以後，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就可以使幹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減少驕傲情緒，想驕傲也沒有驕傲

---

<sup>40</sup> 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有關資料計算（《中國統計年鑒（1983）》，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第13、16頁）。

<sup>41</sup>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第5頁。

<sup>42</sup>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司編：《新中國50年統計資料彙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第3頁。

的時間。<sup>43</sup>

毛澤東以為社會生產力發展階段上的差距也可以像打仗一樣，不斷確定新的目標，然後再通過發動一次次的戰役去攻破。問題是經濟建設不同於戰爭，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不能跨越。馬克思說：“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過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sup>44</sup> 毛澤東幾乎是在用法令或意念取消客觀存在的自然發展階段。由於握有政權，毛澤東每確定一個目標，都能很快實現。毛澤東的經濟目標和經濟政策不斷地跳躍和跨越社會發展階段，從根本上顛倒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

根據毛澤東 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論〉和 1949 年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無產階級在中國取得政權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家將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分散的個體農業和手工業，城鄉資本主義工商業都將長期存在。<sup>45</sup> 但是，建國之初，毛澤東就改變了這個方針，把“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將處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一筆勾銷。1953 年，毛澤東就形成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

---

<sup>43</sup> 〈工作方法 60 條（草案）〉（1958 年 1 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 51 頁。

<sup>44</sup> 〈《資本論》第一版序言〉，《資本論》第一卷，第 11 頁。

<sup>45</sup>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新民主主義論〉（1940 年 1 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 636、643 頁）。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說，中國的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只佔 10%，農業和手工業佔 90%，這“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革命勝利以後，“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就其基本形態來說，還是和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七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 1431、1432 頁）。

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sup>46</sup> 這就是說，從新中國誕生時起，我們就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建立在一種社會化的大生產基礎之上的，是以生產力的鉅大發展為條件的，是一定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但是，毛澤東不僅要在一個傳統的個體農業為基礎的社會裡建設社會主義，而且，僅用幾年的時間就結束了由他規定的本來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和“逐步實現”的歷史階段。幾乎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剛開始提出和醞釀期間，毛澤東就以極大的熱情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後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全國個體農戶的96%以上就都參加了合作社，其中加入高級社的農戶達到87%。農業合作化進程加快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帶動城鄉手工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程的加快。到1956年年底，就宣佈了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在全國基本完成。

毛澤東說：“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惟一的經濟基礎。”<sup>47</sup> 現在，這一目標已經實現。所以，在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sup>48</sup> “一個新的生產高潮已經和正在形成”。<sup>49</sup>

毛澤東推動革命和建設的飛速發展，一個基本的方法就是以極大的勁頭和飽滿的熱情自下而上地動員和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在長期革命和群眾運動中形成的黨的運行機制是十分適應毛澤東發動運動的。偶爾有跟不上步伐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隨時會遭致毛澤東的批評。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對周恩來等人從1956年以來“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的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劉少奇、周恩來等，都在會議上檢討

---

<sup>46</sup> 〈革命的轉變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953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316頁。

<sup>47</sup> 〈革命的轉變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953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316頁。

<sup>48</sup>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2頁。

<sup>49</sup> 〈工作方法60條（草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45頁。



了“反冒進”的錯誤。3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召開了中央會議，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都具有了大躍進的姿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提出，“苦幹三年，改變面貌”。舉國上下的高昂情緒，也激發和感染了毛澤東。4月15日，毛澤東看了河南省封丘縣縣委給毛澤東寫的一個報告，介紹該縣應舉農業生產合作社依靠集體力量，苦戰二年，戰勝自然災害，改變落後面貌的事跡。應舉社的故事感動了毛澤東，讀後異常興奮，不禁欣然命筆，要把它介紹給全國人民。毛澤東寫道：

“一個苦戰二年改變了面貌的合作社”，這篇文章值得一讀。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群眾中的落後階層奮發起來努力趕上先進階層，這個事實標誌著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革命（生產關係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奮進。由此看來，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商店、機關、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群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了，應當永遠使用下去。<sup>50</sup>

毛澤東相信群眾中蘊藏著無窮無盡的力量，相信“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創造出來”，包括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橫

---

<sup>50</sup>〈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77~178頁。70年代以來，不少的人以為毛澤東寫上面這些話是為了鼓勵人口生育。其實，毛澤東這篇文章要傳達的信息遠比生育問題重要得多。毛澤東一氣呵成寫完這篇文章，又馬上給在北京的劉少奇等人寫信要求把它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在同一張信箋上，毛澤東說：“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說‘2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5~7年的餘地的”（〈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79頁）。

跨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一個月後，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通過了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通過了提前五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還通過了“苦幹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一場席捲全國的大躍進，就這樣出現了。人為的革命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僅據戶籍統計的資料保守計算，1958~1961年，全國至少比正常年份多死了1500萬的人口，因生育率的下降又比正常年份少生育2000萬，兩項合計損失3500萬人口。<sup>51</sup>

鄧小平後來總結說：“我們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這往往使我們不能冷靜地分析主客觀方面的情況，從而違反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中國過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錯誤。”<sup>52</sup> 50年代，毛澤東急於改變面貌，跨越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革命。60年代以後，進而提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必須發動“文化大革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方式來解決。<sup>53</sup> 一方面，把黨和國家政權機關當作“繼續革命”的對象，就沒有穩定的社會局面了；另一方面，群眾被動員起來參加無休止的“革命”，也再顧及不到“生產”了。這都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歷史觀和“革命加生產”的人口思想，從而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 四、從“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 適當安排”衍生出“要有計劃地生育”

70年代後期，當計劃生育主管部門把毛澤東關於計劃生育的論述摘引出

---

<sup>51</sup> 此處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處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5）》中〈全國歷年人口自然變動〉有關數據推算（《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第268頁）。

<sup>52</sup> 〈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140頁。

<sup>5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8~809頁。

來宣傳的時候，人們看到毛澤東以明確的語言講節育和計劃生育，是 1957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 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而且，這幾段講話曾經成為我國計劃生育事業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給人的印象是，在持續三天的會議上，先後講過三次，也可見這一問題的重要程度。在過去的宣傳中，三次講話是按照以下順序編排的：

在這裡，我想提一下我國的人口問題。我國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約要增加 1200~1500 萬，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近來社會上談這個問題的人多起來了。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並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 2 月 27 日）

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是最不會管理自己了。工廠生產布匹、桌椅板凳、鋼鐵有計劃，而人類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沒有計劃了，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60 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我今天不著重談節育問題，因為我們邵力子先生是個專門的名家，他是大學專科畢業的，比我高明。還有我們李德全部長，也很注意這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7 年 2 月 27 日）

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也不多啦？這是一種假設。……現在每年增長一千多萬。你要他不增長，很難，因為現在是無政府主義狀態，必然王國還沒有變成自由王國。在這方面，人類還完全不自覺，沒有想出辦法來。我們可以研究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政府應該設立一個部門或一個委員會，人民團體可以廣泛地研究這個問題，是可以想出辦法來的。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能夠使他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這一條馬寅（初）老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沒有放出

來，有人反對，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要有一些辦法。人民有沒有這個要求？農民要求節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節育，城市、農村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日）<sup>54</sup>

把以上三段講話放到產生的特定背景裡，是準確把握和理解毛澤東人口思想必不可少的條件。

上述三段話是毛澤東發表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時說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毛澤東於1956年年底到1957年年初，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提出來的重大理論問題。毛澤東曾把1956年比喻為“多事之秋”。<sup>55</sup> 在這一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蘇共二十大反對斯大林事件，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國內也出現了一些事件，大城市約有一萬工人罷工，一萬名大學生罷課，農村也出現了農民分社、退社，等等。<sup>56</sup> 毛澤東將國內國際上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當作歷史給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提出的新課題。蘇共二十大後，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重要文章，已經總結提出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sup>57</sup> 12月4日，毛澤東給黃炎培的信中又說：“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sup>58</sup> 1957年1月，在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就這一方面的許多問題已經對地方大員們做過兩次講話。毛澤東說：“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sup>59</sup>

<sup>54</sup> 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1頁。引文的順序和格式都按照該書編排的——作者註。

<sup>55</sup>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39頁。

<sup>56</sup> 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810頁。

<sup>57</sup>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sup>58</sup> 〈給黃炎培的信〉（1956.12.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55頁。

<sup>59</sup>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是為毛澤東發表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而特意安排的，參加會議的人員是從全國召集來的1800名黨和國家高級幹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社會各界上層人士。毛澤東像以往那樣，只是在會前寫了一個講話提綱，共12個問題：（一）兩類矛盾：敵我階級之間，人民內部矛盾之間；（二）肅反；（三）社會主義改造——合作化；（四）資本主義改造；（五）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六）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七）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九）如何處理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十）鬧事，出亂子，都不好嗎？（十一）少數民族和大漢族民族問題，西藏問題；（十二）中國可能在三、四個五年計劃內，初步地改變面貌。<sup>60</sup>

在講到第七個問題“關於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時，毛澤東說了前面摘引的第二段“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那段話。由於《毛澤東傳》摘引的記錄稿不僅要比計劃生育部門摘引的更為傳神，內容也有所不同，所以轉抄如下。毛澤東說：

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這一點是世界各國都沒有的。它有這麼多的人，六億人口！這裡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地生產。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毛澤東這個話引起全場大笑）這個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設一個計劃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陣大笑）或者設一個委員會吧，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組織個人民團體來提倡。因為要解決一些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撥一筆經費，要想辦法，要做宣傳。<sup>61</sup>

經過三個半天的小組討論之後，3月1日下午，會議安排包括有馬寅初在內的16位民主黨派、無黨派或實業界的代表發言。<sup>62</sup>在總結講話中，毛

---

357頁。

<sup>60</sup> 〈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提綱）〉（1957年2月27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312頁。

<sup>61</sup>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625頁。

<sup>62</sup> 一般的讀者只知道馬寅初是北京大學的校長，其實，馬寅初更重要的社會地位和職務是

澤東再次談到人口與計劃生育。這就是上述第三段“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也不多啦”那段話。<sup>63</sup>

比較細緻地瞭解毛澤東修改講話的過程，也是準確把握毛澤東關於人口

---

決定中央人民政府產生的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的除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單以外的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委員。此外，他還曾任職於以陳雲為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9月，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後，當選為除了委員長、副委員長以外的65位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所以，這次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馬寅初是當然的參加者。包括《馬寅初全集》在內的不少資料都把馬寅初的發言記為3月2日，是不準確的。查《馬寅初全集》中這篇發言稿來源於中共中央統戰部3月15日的“記錄”。根據楊尚昆關於“竊聽器事件”的回憶，1957年2月27日講話前，毛澤東主動要求錄音。所以，3月1日的會議也應該作了錄音。估計16位民主黨派和社會人士大會的發言，由中央辦公廳3月2日整理有一個記錄稿，統戰部再根據中央辦公廳整理的紀錄稿抄錄的日期。存疑。但確定的一點是，馬寅初的發言是3月1日。因為包括馬寅初在內的16位民主人士發言後，毛澤東就做了這次會議的“結束語”。毛澤東的〈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作結束語的提綱〉註明的就是“（1957年3月1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作結束語的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361頁）。我們在本節一開始轉摘的毛澤東講話的第三段，說馬寅初“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這段講話註明的日期也是3月1日。此外，不少文章和傳記中說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傾聽”了馬寅初的意見，不確。劉少奇於2月18至4月15日外出視察，沒有參加這次活動（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第812~823頁）。包括《毛澤東傳》在內都說，“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除了劉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這次會議。”也不準確。在當時的六名政治局常委裡，至少還有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朱德，也未參加會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新編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577~1593頁）。有不少文章說馬寅初在中南海“暢談”、“暢所欲言”，似乎來源於毛澤東3月1日講話。毛澤東有“暢所欲言”之說，或者出於客套和禮貌，但不準確。馬寅初在這次中南海懷仁堂的會議上就做了十分鐘、大約一千字的大會發言。即使一位學者可以用十分鐘將自己的主要觀點說出來，但絕不可能是“暢談”或“暢所欲言”。至於說毛澤東“傾聽”了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受馬寅初啟發才提出計劃生育，更屬天方夜譚。馬寅初在這次發言中就說，在兩年前人大會議的浙江小組提出我國人口問題，因反對的人多，自動收回。“不料兩年後的今天，我們的最高領袖毛主席對人口問題有同樣的看法，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他所見所聞遠比我廣，得出的結論一定更正確，因此我對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馬寅初：〈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發言〉，《馬寅初全集》第1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1~502頁）。

<sup>63</sup> 在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作結束語的提綱〉（1957年3月1日）中，有“控制在六億人口（控制一個時期少增長，以待條件具備，再作適當增長）”（〈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作結束語的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362頁）。

和計劃生育思想的不可缺少的一環。

這次講話後，為進一步瞭解情況和加深研究，毛澤東又連續在全國宣傳會議和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四個地方的幹部會議上作了多場的講話或演講。其間，毛澤東還召開了許多次不同類別人員參加的座談會，廣泛徵求意見。4月19日，毛澤東親自撰寫了給上海中央局，各個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門和國家機關黨組的通知，要求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限期報告中央。<sup>64</sup> 從4月24日起，只要沒有重大活動，毛澤東就專心致志地修改講話記錄稿。5月7日，在被稱作“自修稿第一次稿”上，毛澤東將整理的講話記錄稿上第七個問題的標題“關於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改為“從六億人口出發”，<sup>65</sup> 並把這段內容大為壓縮。修改的話說：

我國有六億人口，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們做計劃，辦事，想問題，就要從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國有六億人口，好處在這裡，困難也在這裡。困難就是矛盾，矛盾總得去解決，也總是可以用解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可以設想另外一種方針，就是照舊社會那樣，對於大批有困難的人拋棄不管。人民政府不能這樣做。這是製造矛盾的辦法，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

在5月8日“自修稿第二次稿”上，第七個問題增加了一段話：

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後，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我們這樣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攬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想辦法，社會是能夠想出很多很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這樣做。

這次把計劃生育的論述改為：

<sup>64</sup> 〈限期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報告中央〉（1957年4月19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2頁。

<sup>65</sup>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677頁。

在這裡，我想提一下我國的人口問題。我國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約要增加 1200~1500 萬，這也是一個重要問題，近來社會上談這個問題的人多起來了。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如果這個辦法可行的話，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實行，只能逐步地推行，並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sup>66</sup>

這就是我們在本節一開始引述的三段文字中的第一段話的來歷。筆者所以用以前兩段不同處理的方式，全文抄錄一遍，是因為這一段話已經將計劃生育部門引述時省略掉的一些文字補充進來了。任何一位讀者都可以發現，毛澤東用了一段思想深邃、文字嚴肅的論述取代了 1 月 27 日講話時生動、活潑與詼諧、幽默的那段話。5 月 8 日晚 10 點，在“自修稿第三次稿”上，毛澤東給第七個問題又增加和改寫了一段話：

爲什麼要提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於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並且將一切消極因素轉變爲積極因素，爲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是我們的本錢。

5 月 9、10 日，毛澤東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但是，第七節中有關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的內容卻被全部刪去了，另外加了一句話：“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sup>67</sup> 毛澤東決定把經過四次“自修”的稿子作爲“草稿第一稿”，分發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分書記處成員、幾位黨內“秀

---

<sup>66</sup> 此段根據彭珮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和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的有關段落連結爲一個完整的段落。文中“在這裡，我想提一下我國的人口問題”，是《全書》中有而《傳》中所沒有的；“如果這個辦法可行的話，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實行”，是《全書》中沒有（從 20 世紀 70 年代由計劃生育部門將這一段文字非正式地摘引出來，到後來出版物上刊載，我們看到的都是將這一句用“……”代替）《傳》上有的（彭珮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131 頁；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 682 頁）。

<sup>67</sup>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 685 頁。



才”，徵求他們的意見。

5月24日，毛澤東決定將第二個徵求意見稿發到在京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幾位黨內“秀才”。毛澤東在修改的徵求意見第三稿中，又恢復了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內容。25日，徵求意見範圍擴大到在京參加會議的各個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27日，毛澤東修改出徵求意見的第四稿。28日，毛澤東要求將徵求意見的第五稿發給各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以及幾位黨內“秀才”。6月1日，在被稱為“秀才”的參與下，形成了徵求意見第六稿。6月16日，稿子僅作了少量修改，為第九稿，並註“6月16日定稿”。17日，又有一次修改，註明“最後定稿”。6月19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同一天在《人民日報》和蘇聯《真理報》發表。<sup>68</sup> 公開發表後，我們最為感興趣的這一部分成為：

#### 七 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這裡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六億人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為什麼要提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於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並且將一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的事業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是我們的本錢。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我們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在蓬勃地發展著，成績很大，但是，在目前社會大變動的過渡時期，困難問題還是很多的。又發展又困難，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應當解決，也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

---

<sup>68</sup> 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和文稿的修改情況，主要取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第16和17章“〈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整風反右”（上、下）兩章。

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決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後，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我這樣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團體想辦法，可以由群眾直接想辦法，他們是能夠想出很多很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團體和各地群眾這樣做。<sup>69</sup>

本文所以比較詳細地敘述那三段被認為屬於毛澤東有關人口與計劃生育方面最為重要的論述的產生或來歷、修改的過程，及其最後的命運，是要說明這一通常被認為是毛澤東最重要的人口思想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的地位，以利於我們準確理解和把握毛澤東人口思想。首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最重要的著作。毛澤東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當作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的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是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中最重要內容，在毛澤東思想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計劃生育這一後來被我國政府認為是由毛澤東開創的事業和“基本國策”，卻沒有進入毛澤東要講的12個問題之中。不錯，毛澤東在這裡提出了計劃生育。而且，毛澤東十分重視這一著作。從講話產生，到公開發表，歷時113天，先後四次“自修稿”和十個徵求意見稿，可謂認真修改、反復推敲。令人深思的是，公開發表時不僅刪去了2月27日講話中關於“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這段話，沒有收入3月1日總結講話中回應馬寅初的“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也不多啦”那段話，甚至連“自修稿的第二次稿”中重新撰文修改和添加的“在這裡，我想提一下我國的人口問題”那一段文意嚴謹的話也沒有了。薄一波曾經說過，毛澤東發表講話時，“（1）刪去了對斯大林和蘇聯的批評。這些在講話中篇幅是很大的，在發表時一句也沒有了。（2）刪去了對若干有‘左’的傾向文章（以及有右的傾向的文章）的批評。（3）刪去了各種各樣的具體實例。這些內容之所以刪去，有的是當時不應公開；有的是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還有的是可有可無等等。”<sup>70</sup> 無論毛澤東刪去計劃生育的內容屬於薄

<sup>69</sup>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2~783頁。

<sup>70</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

一波說的哪一種情況，都無法迴避這樣一個事實，即 30 年來我們一直引述宣傳證明毛澤東主張應該實行計劃生育的一些論述，實際是毛澤東廢棄不用的一些話。

其次，毛澤東是在講“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時衍生出“要節育，要計劃生育”來的。但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為什麼就要節育和計劃生育呢？毛澤東最後沒有收錄節育和計劃生育的內容，說明二者不存在必然的邏輯關係。<sup>71</sup> 由於看不到 2 月 27 日講話的記錄稿，所以無法確定那次講話時是如何展現這一推理的。在提前寫的講話提綱中，毛澤東在“（七）統籌兼顧，適當安排”下面寫有“從六億人口出發，節育。”幾個字。<sup>72</sup> 但是，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這裡，即從我國那時已有的六億人口出發，為什麼就一定要節育和計劃生育呢？1 月 27 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結束時，也曾講到這一方針。不過，那次的提法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另外，那次也講到“六億人口”，卻沒有引出節育問題，說明六億人口與節育或計劃生育也都沒有必然的聯繫。但是，讀那次講話，可以幫助我們尋理解其間邏輯關係的線索。毛澤東說：

第二點，統籌兼顧，各得其所。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在延安的時候，就採取這個方針。1949 年 8 月，大公報作社評一篇，說什麼“不要另起爐灶”。重慶談判期間，我對大公報的負責人講，你那個話我很贊成，但是蔣委員長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不另起爐灶怎麼辦？那個時候，我們向蔣介石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各得其所。現在是我們管事了。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包括把國民黨留下來的軍政人員都包下來，連跑到臺灣去也可以回來。對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殺的，都加以改造，給生活出路。民主黨派保留下來，長期共存，對他們的成員給予安排。總而言之，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比如統購

---

590 頁。

<sup>71</sup> 根據毛澤東的〈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其中第三個問題也是講“統籌兼顧，適當安排”。但是，1957 年 3 月 19 日上午、下午分兩次在南京和上海講的都是“加強思想教育”，而不是節育和計劃生育問題，也說明“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與計劃生育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1957 年 3 月 19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 403 頁）。

<sup>72</sup> 〈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 312 頁。

統銷，一切城市人口和農村裡頭的缺糧戶，我們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對那些全家沒有人就業的，還要救濟，總以不餓死人為原則。所有這些，都是統籌兼顧。這是一個什麼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戰略方針。實行這樣一個方針比較好，亂子出的比較少。<sup>73</sup>

根據楊尚昆 1 月 27 日的筆記，毛澤東還說：“人是要吃的，常常要想到。”<sup>74</sup>

2 月 27 日以後，毛澤東在其他場合不止一次地講過“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3 月 20 日，毛澤東在南京作的報告中強調說，“這是一個戰略方針”。<sup>75</sup> 在這一次講話中，毛澤東回答了我們的疑問。他說：

1949 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們只有 2200 億斤糧食，去年我們就有了 3600 億斤糧食，增加了 1400 億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們這個國家的好處就是人多，缺點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糧食多，增加這 1400 億斤糧食就不見了，有時還覺得沒有糧食。1949 年缺少糧食，現在還是不夠。<sup>76</sup>

毛澤東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場上，把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大的家庭，“我們都管”。六億人口“是要吃的”。從一個家庭出發，“嘴巴多就要糧食多”，人口增長快，增產的糧食就不見了，有時還覺得沒有糧食，很自然地提出了節育和計劃生育的問題。

第三，如果按照毛澤東從講話到〈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公開發表的時間順序仔細研究，可以發現我們感興趣的這一部分的修改思路是按照兩條線索此消彼長地進行著。第一條線索是關於節育和計劃生育的提出及修改過程。建議讀者將本節開頭摘引毛澤東的三段論述按照發生時間的先後順序排列，然後按二、三、一的順序重讀一遍，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最初

<sup>73</sup>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339~340 頁。

<sup>74</sup> 《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第 275 頁。

<sup>75</sup>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 532 頁。

<sup>76</sup> 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 131 頁。

一次的講話活潑、幽默，思緒恣意縱橫、自由馳騁，後兩段則一次比一次嚴肅和拘謹。相對於前一次，較後一次的總在不斷地增加一些限制性的語言，譬如1月27日那段話海闊天空，無遮無攔，3月1日則說“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也不多啦？這是一種假設。”<sup>77</sup>到5月8日修改稿又說，“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如果這個辦法可行的話，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實行，並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其實這裡只是抽出一些主要句子來說明，如果讀者按照時間發生的順序閱讀，就可以跟隨作者感受從一個較高的語境逐步退卻的那種氛圍和整體的演變。另外，5月8日，毛澤東在“自修稿第二次稿”中用修改的段落取代講話稿，不只是文字嚴謹取代了活潑語言，而且有關人口和計劃生育的內容也遠都沒有前次涉及的那麼多了。還有，5月10日，毛澤東“自修稿第四稿”將節育和計劃生育的內容完全刪去，5月24日予以恢復，最終決定還是全部刪除，反映出作者雖有過猶豫和反復，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完全放棄和退卻到底。

與此相對應，第二條思想線索是集中在尊重人、對人的價值的崇尚與肯定方面。我們仍然按照時間發生順序來閱讀，毛澤東不斷地在這一部分增加肯定人、肯定人民群眾和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等方面的內容。譬如，5月7日，毛澤東把胡喬木整理的講話記錄稿第七個問題的標題“關於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直接改為“從六億人口出發”。修改的話中說：“我國有六億人口，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5月8日，增加的話中說：“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後，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修改的有關人口與計劃生育的一段話中說：“如果這個辦法可行的話，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實行，並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5月8日晚10點鐘的修改稿，要求把六億人口和從六億人口出發的問題提高到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的高度來認識，還說：“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是我們的本錢。”5月9、10日的修改稿，刪去了人口與

---

<sup>77</sup> 按照由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建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編寫完成的《新中國人口50年》提供的講話片斷，毛澤東在1957年3月1日講話中還說：“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地生產，這是一種設想。這一條馬寅初講得好”（路遇主編：《新中國人口50年》，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年，第983~984頁）。這樣，不僅3月1日相對於2月27日是一種退卻，而且客觀地評價毛澤東這一時期提出的計劃生育思想，僅僅是他的一種假設或設想。

計劃生育的內容，增加了一句話：“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總之，如果讀者細心跟著毛澤東的修改過程閱讀有關的內容，完全可以感受到毛澤東思緒的變化，感受出在人口與計劃生育的思路退卻的同時，關於人的價值、人民是歷史主人和“人是第一可寶貴的”等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人口思想的復歸。

## 五、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計劃生育

在毛澤東領導下，黨和政府於 1954 年就把群眾的避孕和節育要求提高到“人民需要的帶政策性的問題”來認識，要求衛生部、商業部和生產部門做好服務工作。為什麼毛澤東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講話時又提出這一問題呢？1956 年 10 月 12 日，在接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毛澤東說：

過去有些人批評我們提倡節育，但是現在贊成的人多起來了。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目前中國的人口每年淨增 1200~1500 萬。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sup>78</sup>

毛澤東認為，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人類本身的生產也應該計劃化。也就是說，毛澤東由計劃經濟進一步提出計劃生育。由國家的計劃到家庭的生育計劃，而不是各個家庭僅僅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訂生育計劃，這就使得計劃生育這一概念有了通常的節制生育所沒有的一些特別的含義。我們還無法確定毛澤東最早一次闡述計劃生育時的具體情況。<sup>79</sup> 但是，可以確定的

<sup>78</sup> 〈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的談話〉（1956 年 10 月 12 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153 頁。這是截至目前包括計劃生育部門在內，少有人鮮知的毛澤東最早一次關於計劃生育的一段重要論述。因為計劃生育一詞是後來才在社會上流行起來的，這次會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毛澤東突然問：“在南斯拉夫是否實行計劃生育？”毛澤東直接用“計劃生育”提問，說明這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毛澤東可能還有過一次或多次議論過“計劃生育”。

<sup>79</sup> 根據筆者對歷史文獻的檢索，計劃生育這一詞語最早在 1956 年出現。不過，那也只限於幾次高層的內部會議和極個別的文件，社會上並沒有這一提法。毛澤東 1957 年 2 月 27 日講話後，計劃生育一詞才開始在社會廣泛流傳，節育、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三個詞語交

是，毛澤東提出的計劃生育的概念是與國家經濟計劃相聯繫的。<sup>80</sup> 1969年3月24日，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座談會上說：“要計劃生育，要節育。這件事，毛主席至少講過三次，一次是定‘一五’計劃的時候，一次是‘大躍進’的時候，一次是定‘三五’計劃的時候。”<sup>81</sup> 也說明了，從計劃經濟的要求上認識計劃生育，是理解計劃生育理念的本質。我們知道，節育是工業革命以後越來越普遍的現象。西方發達國家比我們早一百多年，像印度等有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也在我們之前就開始提倡了。所以，有兩個計劃生育。一個是家庭計劃和節育意義上的計劃生育，人民民主權利意義上的計劃生育；一個是與國民計劃相聯繫的計劃生育。由生產計劃產生生育計劃的，才是毛澤東的發明。“計劃生育是毛主席提倡的”。<sup>82</sup>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我國計劃生育事業就是由詮釋毛澤東的這一理念而迅速膨脹與發展起來的。<sup>83</sup>

---

替使用。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仍然是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並用。但是，至此以後，黨和國家的文件及其他各類正式文獻就都使用計劃生育一詞，節育和節制生育這兩個詞彙再就很少出現了。

<sup>80</sup> 1965年12月17日，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楊振亞說：“我們回憶一下，毛主席在1955年就提出了這個問題，這是有關社會主義建設戰略性問題。計劃生育是毛澤東思想運用到人口問題上的科學論斷。”關於計劃生育的性質，他引述了一句無法核對的“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說：經濟建設有計劃，人口發展無計劃，必然衝擊計劃經濟”（彭珮雲主編：〈關於計劃生育工作問題——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楊振亞在湖南省第三次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293頁）。這句引述的話說明了從經濟計劃產生生育計劃，是把握毛澤東當時提出計劃生育思想的核心和關鍵。

<sup>81</sup> 彭珮雲主編：〈周恩來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6頁。

<sup>82</sup> 彭珮雲主編：〈中共中央批轉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通知〉，《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2頁。

<sup>83</sup> 那還是一個對毛澤東狂熱崇拜的時代。僅僅根據毛澤東的一句話就可以掀起一場運動。但是，毛澤東在世的時候，還很少見到直接從計劃經濟原則要求計劃生育的宣傳。1978年6月26日，陳慕華在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說：“我國發展國民經濟是有計劃按比例進行的。我國人口的增長也應納入國家計劃，有計劃地增長”（彭珮雲主編：〈陳慕華在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53頁）。自此以後，這一思想開始成為社會意識的主流。這一時期的許多紅頭文件和各大報刊上都反復說：“我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決定了我國人口增長一定要做到有計劃，像調節物質生產一樣調節人類自身的生產”（彭珮雲主編：〈中共中央批轉〈關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的通知〉，《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頁）；〈書記掛帥，全黨動手，進一步搞好計劃生育〉，《人民日報》1978年7月9日；〈必須高度重視計劃生育工作〉，《人民日報》1979年1月27日；〈一定要有計劃地控

毛澤東為什麼在這個時期提出計劃生育呢？因為，經過幾年的經濟恢復和建設，特別是國家“一五”計劃的一些重大項目有不少已經建成或者即將建成，工業化迅速改變了國家的經濟面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中國富強，這是毛澤東和毛澤東之後幾代人的堅定信仰。在毛澤東看來，工業化、計劃經濟、社會主義，都是一體的。正如鄧小平在 1985 年說的那樣：“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麼，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sup>84</sup> 計劃經濟的實質是由政府集中管制和配置經濟資源。但是，政府統制和管理一切，無法把許多問題解決得好。毛澤東把原來的“統籌兼顧，各得其所”改為“統籌兼顧，適當安排”，表明已經發現“我們都管”卻無法做到使各個方面都能夠滿意的程度。這時的毛澤東還不可能從計劃體制方面尋找原因，那就因為中國人口太多了。“它有這麼多的人，六億人口！這裡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社會生產已經計劃化了，為什麼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即使從計劃經濟的原則出發提出計劃生育，畢竟還是把社會問題的癥結歸結到人口生育方面，其結果和馬克思主義批判的馬爾薩斯人口論還是走到一起來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怎麼也和資產階級的政府一樣嫌棄人口過多起來了呢？1956~1958 年，毛澤東常常遭遇到這一個問題的困擾。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是通過最終放棄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達到矛盾的解決的。講話出版後的一段時期內，毛澤東還沒有完全擺脫因人多導致一系列困難的思考，但已不像講話和講話前那樣純粹講節育、要求與

---

制人口增長〉，《人民日報》1980 年 2 月 11 日；〈計劃生育工作要常抓不懈〉，《人民日報》1981 年 1 月 27 日。據《陳雲文選》的一條註釋說，1980 年 6 月 15 日，黨中央副主席陳雲給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陳慕華寫信說：“限制人口、計劃生育問題，要列入國家長期規劃、五年計劃、年度計劃。這個問題與國民經濟計劃一樣重要”（《陳雲文選》（1956~1985），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352 頁註 30）。《陳雲文選》的這條註釋不準確，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是在 1981 年 3 月 6 日經過五屆全國人大第十七次常委會議決定設立的。陳雲寫信時，陳慕華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計劃經濟是那個時代無可懷疑和不可動搖的一項原則。所以，物質生產的計劃性要求人口生育的計劃性，也就成為我國政府以及政府要求全體人民都必須遵循的一項基本政策。計劃生育能夠在 70 年代很短的幾年內發展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的一項“基本國策”和基本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從這一基本理論、基本原則出發推導出來的。

<sup>84</sup> 〈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37 頁。



生產計劃相聯繫的計劃生育之類的論述了，也不再設置計劃生育的國家機關的主張了。<sup>85</sup> 與此同時，這一階段的有關講話中重視人的價值、突出人民性的思想性則明顯加強了。所以，我們在這一時期的一些沒有經過字斟句酌的推敲處理的講話記錄稿中，常常可以看見兩個毛澤東：一個是對人的價值、對人民群眾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和無限崇尚的毛澤東，一個深受衆多人口重壓的毛澤東。在沒有完全放棄從人口方面尋求出路之前，毛澤東總是在自己設置起來的兩塊界碑之間左衝右突。1957年10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是毛澤東發動經濟建設大躍進前夕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時的毛澤東已經開始調動全國人民走向一條狂熱的大道。10月9日，毛澤東在會議結束前的講話中說：

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21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麼多時間。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我看一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盡夠吃。當然，還是要節制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sup>86</sup>

在講到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時，毛澤東說：

---

<sup>85</sup> 在毛澤東時代，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的設置是毛澤東十分關注的問題。機構改革不僅始終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進行的，而且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是，毛澤東在世時，一直沒有設立他所提出的“計劃生育部”之類的國家機關。1957年8月20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議陳雲任國務院的節育委員會主任，但並未設立辦事機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69頁）。1964年1月，國務院成立了由有關部委參加的計劃生育委員會，下設辦公室，節育和計劃生育的具體業務工作仍歸衛生部。在衛生部內部的分工上，節育工作長期隸屬於婦幼保健司管理。1971年12月，衛生部軍管會通知，從1972年1月15日開始，計劃生育工作改由中國醫學科學院管理，表明“文化革命”期間，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及辦公室在國務院機構的幾經變動中已不再存在。1973年7月，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下設領導小組辦公室，計劃生育工作的具體管理仍隸屬於衛生部。各個省、市相應建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領導小組辦公室設於衛生廳（局）。1981年3月6日，經過五屆人大常委會決議，才正式設立了計劃生育的政府機關——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

<sup>86</sup>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69頁。

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計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sup>87</sup>

幾天後，我們在僅能得到的兩句講話中，也可以發現計劃生育和人民性並存的現象。10月13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說：

計劃生育也有希望做好。這件事也要經過大辯論，要幾年試點，幾年推廣，幾年普及。<sup>88</sup>

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本來要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鼓舞士氣，原準備只講“人多好”，並沒有想講節育和計劃生育問題。<sup>89</sup>但是，在講話時，卻又

---

<sup>87</sup>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71頁。這段話是毛澤東事前就有所準備要講的，在提前寫就的講話提綱中有“人口問題：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做，達到計劃生育，是否可能”（〈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講話提綱〉（1957年10月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594頁）。《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與《毛澤東文集》選輯的這兩段話的文字相同。根據《毛澤東文集》的題尾註解，該文“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關於農業問題〉（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310頁）。但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引述與這裡的文字略有不同，特轉錄如下：“抓人口問題恐怕也是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十年不搞，將來又增加到八億。來個十年計劃，三年宣傳試點，再有三年推廣，過去六年了，還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廣。看可不可能？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我主張中學要上課，要教育怎麼樣生孩子，怎麼樣養孩子，怎麼樣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生就不要生。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2頁）。

<sup>88</sup> 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2頁。

<sup>89</sup> 在講話提綱中，原準備講的這一問題是“人多好，少吃一點，東方風味，身體健康”（〈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1月2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42頁）。

不得不為驅散頭腦裡的人口和計劃生育的陰影再設置一些文字。毛澤東說：

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恐怕還要發展一點。你現在要人家節育，但我們一是工具不夠，二是宣傳不夠。農民字都不認識，還有早婚的習慣，你強迫他節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人類還不能掌握這個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幾億人口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我看要搞到七億人口，就會緊張起來，邵（力子）先生那個道理就會大興。邵先生之道大興之日，是七億人口到八億人口之時。你現在講，他橫直不聽。但是我並不是說不要做宣傳，不要製造工具。要做宣傳，要盡可能做宣傳。我是贊成節育的，並且贊成有計劃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樣能控制。現在人多一些，氣勢旺盛一些。要看到嚴重性，同時也不要那麼很怕。我是不怕的，再多兩億人口，我看問題就解決了。走到極點就會走向反面。現在我看還沒有達到極點。中國地大物博，還有那麼一點田。人多沒有飯吃怎麼辦？少吃一點。

要節省。一方面要節育，一方面要節省，要成為風氣。<sup>90</sup>

中共中央成都會議，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過程中的一次重要會議。18天的會議，毛澤東和各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們互動，黨的高級幹部一個個都已經是躍躍欲試了。3月23日，毛澤東在陶魯笳發言時的插話，又一次在對立的兩極之間穿梭。毛澤東說：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二畝五分地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不對。應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7.5~8億時再控制。現在還是人少，很難叫農民節育。少數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區可不節育，其他地方可試辦節育。一要樂觀，不要悲觀；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制了。<sup>91</sup>

馬克思說，社會的條件只能適應一定數量的人口。但是，毛澤東還認識不到計劃體制對中國人口的壓迫。1986年，鄧小平開始反省計劃經濟的局限性。他說：“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

<sup>90</sup> 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2~133頁。

<sup>91</sup> 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3頁。

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sup>92</sup>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鄧小平開始尋求市場化改革的趨向，把中國引導到一個快速發展的軌道上。不過，這已經是毛澤東去世十多年以後的事情了。為什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下的中國會產生嚴重的人口問題，是毛澤東臨終前也沒有弄明白的問題。所以，計劃生育曾是縈繞在毛澤東頭腦裡的一個理念和思考。由於這一理念與他在戰爭年代獲得和形成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人口思想有著明顯的衝突，經過對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記錄稿的修改，已經動搖了實行計劃生育的理念。<sup>93</sup> 1958年春天之後，毛澤東幾乎再也沒有主動講過與經濟計劃相聯繫的計劃生育。<sup>94</sup> 1959年前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編輯出版工作已經

---

<sup>92</sup>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48頁。

<sup>93</sup> 如果從現在的資料看，毛澤東有實行計劃生育的想法只是集中在1956年10月12日接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到1958年春天，前後大約有一年半的時間。不過，根據一些資料的情況判斷，我認為毛澤東產生這一想法的時間似乎還要提前一些。

<sup>94</sup> 還有一種說法，1974年2月，毛澤東在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談話時還說：“中國人太多”（孫沐寒：《計劃生育史稿》，北方婦女出版社1987年，第165頁）。查人民出版社發表的毛澤東和卡翁達談話，僅只有兩處說人口，但都不是講中國的人口。毛澤東在這兩處說：“第三世界人口多啊！”“第三世界人口很多。”其實還是說人多力量大，足以同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抗衡（〈關於三個世界劃分問題〉（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9頁）。

根據計劃生育部門提供的文獻資料，1975年1月，毛澤東還做過一段指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彭珮雲主編：〈毛澤東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3頁）。孫沐寒在上一段引述的同一地方說，這是毛澤東在1974年12月29日的批示。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編寫的《當代中國的計劃生育事業》，也認同了孫沐寒的這個說法（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計劃生育事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第19頁）。不少人據此認為，毛澤東直到逝世前一年還念念不忘人口控制工作（楊魁孚：〈學習毛澤東人口思想〉，《人口與計劃生育》2003年第12期；紀曉華：〈毛澤東與計劃生育〉，《黨的文獻》2001年第一期）。還有個別學者把這一句話誤引為1957年1月，該文把“不行”引為“不可”（郭志儀：《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我國五六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四期）。這句話來源於中共中央〈批轉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通知〉，在國家計劃委員會〈關於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中，“第七，發展文教衛生事業，搞好計劃生育，搞好環境保護。”在關於計劃生育工作的一段話中，起首一句是“計劃生育是毛主席倡導的，人口非控制不行。”

根據近年一些對毛澤東晚年生活情況的披露，從1974年7月份開始，身患多種疾病的毛澤東已經離開北京，赴武漢、長沙“易地休息”。這年春天，毛澤東的視力下降，看

進入最後階段。<sup>95</sup> 1960年初春，當毛澤東選擇廣州市郊區的一處別墅坐下來

東西日益模糊。有時需要秘書代讀文件、在文件上畫圈。毛澤東到武漢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對眼病會診。8月，確診毛澤東雙眼都患有老年性白內障，其中右眼稍存光感，左眼稍好。10月抵達長沙時，毛澤東右側麻痺，要人餵食。1975年2月8日，離開長沙經南昌到達杭州。這時的毛澤東身體已經非常虛弱，除了白內障、說話含混不清外，兩腿時常疼痛，腳也腫得很厲害，站立不起。從醫療小組給政治局彙報的日程推算（在這次彙報之前有關毛澤東的病情只有周恩來等極個別領導人和毛澤東身邊少數幾位工作人員知道），2月10日中央簽署批轉計委報告的日子，應該是難得經毛澤東同意而為他進行身體檢查的時間。連續四天的體檢表明，毛澤東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瘡和血中含氧量過低等疾病。咳嗽得很厲害，痰很多，吐不出來。張玉鳳用毛巾裹住手指，伸進主席口腔，從嗓子眼裡把痰摳出來。有的材料直接就說，毛澤東已經有一年看不見東西了。總之，1974年以後，特別是該年年底到1975年2月10日前後，毛澤東的眼睛和其他疾病都到了很嚴重的程度（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1380~1402頁；孟蘭英：〈眼科專家唐由之回憶〉，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7年12月30日，參見<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wrgs/2007/1230/071230326150165E792E1B49KC3BK1B.html>；名人：〈毛澤東晚年疾病是如何惡化終告不治的〉，參見[http://www.mrzi.com/mrzt/jcwz/200803/mrzt\\_8791.html](http://www.mrzi.com/mrzt/jcwz/200803/mrzt_8791.html)；〈張玉鳳首次披露：我所知道毛澤東的部分真相〉，參見<http://data.book.hexun.com/2618386.sh.html>）。

另外，那時的中央文件格式是，如果有毛澤東的批示或圈閱，勢必註明“毛主席已批示”、“最高指示”或“毛主席已圈閱”。如果不是一般性地批示“同意”，而是有明確的批示語言，則屬於“最高指示”，要求傳達不過夜，通過群眾上街遊行和召開大會傳達。這份文件屬於“毛主席已圈閱”，圈閱時間1975年2月10日。應該是工作人員代讀文件，並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畫圈”。說明“人口非控制不行”不是毛澤東的話。我們再看國家計委的報告中有關計劃生育的話：“計劃生育是毛主席提倡的，人口非控制不行。遵照黨中央指示，各級黨委都要把這項工作列入議事日程，指定一位負責同志抓好這項工作。要動員各方面的力量，搞好宣傳教育，提高群眾實行晚婚和計劃生育的自覺性。把避孕藥具送上門，方便群眾，注意做好婦幼保健。”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人口非控制不行”是計委的報告中的話，而不是毛澤東的話。雖然毛澤東“圈閱”同意，但不能把這個文件中的話都當作是毛澤東講過的話。其次，這段話中既沒有毛澤東早先根據國家計劃制訂生育計劃的內容和意向，也沒毛澤東逝世後發展的按照政府政策規定生育的意思。所以，即使毛澤東“圈閱”表明已同意報告中的“人口非控制不行”，但那時並沒有70年代後形成的現行計劃生育制度，文件中這段話不具有現在的語境，從而也不具有現行計劃生育制度的含義。

<sup>95</sup> 1949年6月，黨中央決定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1951年初春，毛澤東已經通讀過後來分為四卷本的一百多萬字的稿件，其中第一、二、三卷分別於1951年、1952年、1953年出版。按照原來的計劃，第四卷收錄解放戰爭和建國後的文章。由於建國後的一些文章距離公開出版的時間太近，出版一再推遲。在決定將解放戰爭時期的文章編輯為一冊後，

審讀第四卷文稿時，被收錄作為該選集最後一篇文章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批判艾奇遜的一些鏗鏘有力的文字再次映入眼簾：

中國人口廣大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sup>96</sup>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注定要成為一篇劃時代的作品。1960年9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時間過去了11年。按照中國舊曆，為12年，正好一個地支輪回。1949年9月，毛澤東寫完〈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也就是從那一刻起，毛澤東開始把中國帶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1960年9月，當毛澤東把〈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公開出版後，又以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應有的大無畏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sup>97</sup> 包括三年

---

第四卷的出版時間就變得清晰起來。

<sup>96</sup> 毛澤東：〈六評白皮書〉，《人民日報》1949年9月17日。準備出版審讀時，毛澤東在引述的這兩段話中改動了兩處。一處將“中國人口廣大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句中“廣大”改為“衆多”，一處將“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句中添加一“創”字為“創造出來”（〈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515、1516頁）。

<sup>97</sup> 直到1976年去世，毛澤東不僅沒有公開發表他的有關於節育和計劃生育的文字，甚至於都沒有像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那樣在公眾中有一個明確地贊成計劃生育的形象。與毛澤東同期的中央政治局六名常委中，除了毛澤東和朱德以外，其他四人在社會上都有鮮明地主張節育和計劃生育的形象。1957年3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適當地節制生育〉中說：“劉少奇同志在1954年12月27日召開了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座談會以後，國務院第二辦公室指定有關部門負責人組織了節育問題的研究小組，提出了開展節育工作的一些辦法。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同志代表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又一次說明應該‘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我國現行計劃生育制度就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的鄧小平時代建立起來的。鄧小平時代的旗幟應該包含鄧小平和陳雲兩位老人。但是，鄧小平可能是最能領悟和深諳毛澤東方法的領導人之一。內部資料引述的鄧小平談論計劃生育的論述不少，經本人同意公開發表的卻不多，三卷本的《鄧小平文選》中不僅一篇關於計劃生育的文章都沒有被收入，而且連相關的文章中有關計劃生育的講話也是絕無僅有。特別有意思的一個事情是，根據其

經濟困難時期在內，毛澤東再都沒有說過“它有這麼多的人，六億人口”、“少生一點就好了”，以及“要有計劃地生育”之類的話。<sup>98</sup>

## 六、幾點結論

第一，人口理論是關於一定社會人口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其解決方法的學

---

他方面的資料，鄧小平在某一個場合分明講述了計劃生育問題，但在《鄧小平文選》發表這一個講話時，偏偏把有關計劃生育的內容刪去了。譬如，根據彭珮雲主編的《中國計劃生育全書》，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會見李政道時說：“最近報紙報道，由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過去18年我國少生兩億多人口，不然現在是13億人。這兩億人我們措不起，我們所取得的發展成果都會被吃掉。堅持計劃生育政策我們不動搖。我們要嚴肅對待國際上責備我們的人。總之，我們有我們的責任，要對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負責，要發展經濟，使他們生活得更好”（彭珮雲主編：〈鄧小平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9頁）。但是，引文中“總之”以前有關計劃生育的談話，在入選《鄧小平文選》時卻被全部刪去了（〈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26頁）。根據《毛澤東傳》的作者和編輯班子的集體處理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稿來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集體對於我國計劃生育問題的認識都是持肯定態度的。所以，《鄧小平文選》的編輯班子不會不把鄧小平過去幾十年中許多有關計劃生育的講話和其他類稿件選編入僅供鄧小平決定的文稿中，是鄧小平決定把相關的內容刪去的。我對這一“鄧小平現象”的理解是，1954~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和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相當於毛澤東的大秘書。但他又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一位很有心計的政治家。他會用心注意毛澤東的細節。鄧小平與劉少奇、周恩來（更不用去說陳雲及其他人了）不同的是，他可以更多地接近毛澤東，可以更多地通過毛澤東的秘書班子和毛澤東直接處理的文件接近毛澤東，從一位政治家的角度審視、理解和感受毛澤東。他看到了毛澤東在對待計劃生育這一問題上的前後變化，甚至於很可能注意到了毛澤東在修改“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稿過程中的一些不為人重視的細節。他沒有毛澤東的理論素養，也不一定能夠理解毛澤東處理這一問題的具體含義。但他知道這裡面一定有某種奧妙。所以，鄧小平在這一問題上跟隨了毛澤東。根據前面的引述，陳雲是周恩來提名的第一任國務院節育委員會主任。在《陳雲文選》中不僅收錄了經過本人選定的〈必須提倡節育〉的文章，而且在這篇文章所加的註釋中還增加了一封給陳慕華的信，明確主張人的生育也應該像物質生產一樣執行國家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

<sup>98</sup> 毛澤東有時議到這一問題，譬如1965年8月20日與衛生部負責人的談話、1972年與外交部幾位同志的談話、1965年和1970年兩次與美國朋友斯諾的談話，都僅限於節育意義上的計劃生育，與政府生產計劃相關聯的計劃生育並非一回事。

說。毛澤東人口思想是毛澤東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理論和觀點的概括。毛澤東不是一位專門研究人口現象的學者。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毛澤東一生都在尋求解決近現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問題的道路和方法，並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翻身解放和成功地使國家獲得了一定的工業基礎。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人口思想是和他的偉大革命實踐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不能離開特定的歷史背景研究和理解毛澤東人口思想，也不應該把毛澤東人口思想和毛澤東思想整體割裂開來。

第二，人口理論必須要回答產生人口問題的根源是什麼。這就決定了人口理論不是關於增加或者減少人口的學說，而首先是一種歷史觀。毛澤東在革命鬥爭中接受和繼承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分析中國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正確揭示了中國人口問題的性質和歷史根源，特別是在批判美國政府所持的唯心歷史觀的馬爾薩斯人口決定論觀點過程中，全面闡述了自己的人口思想。“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和“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是毛澤東人口思想中最主要和核心的內容。雖然這兩條的具體表述都具有革命戰爭年代的痕跡和批判的色彩，但是，它們集中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歷史觀的精髓。由於毛澤東人口思想所具有的人民性和進取性的品格，歷史才選擇了毛澤東，把其塑造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同樣，由於這一思想所具有的品格，使其能夠成為動員全黨，並喚起和帶領全國人民爭取國家獨立、建設美好家園和尋找富裕生活的全民族的共同理念。這是毛澤東一生都在努力實踐的理念和人口思想，也是產生毛澤東領導下的革命年代的人民戰爭、和平年代的群眾運動的思想基礎。

第三，新中國建立以後，毛澤東開始在一個新的歷史時代探索和實踐他的人口思想。將一個經濟文化落後和人口衆多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明程度的偉大國家，是毛澤東提出並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擁護的總目標。人民政府通過在城市依靠工人和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在農村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辦法，不長的幾年就基本解決了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在一個傳統農業國家進行工業現代化建設，必然地創造出人民的新生活，自然地發生包括傳統婚姻制度、生育觀念、生育行為和一系列其他社會習俗在內的社會許多方面的矛盾和衝突。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政府站在社會變革的前列，頒佈和實施新的法律法規，支持人民的新生活。特別是黨



和政府把婚姻和節制生育問題提高到人民民主權利的高度，廢除封建婚姻制度，改變限制避孕和節育的有關規定，成為 50 年代初期最有影響的兩項重要改革。勞動人民經濟翻身、政治解放，人民團結，民族和諧，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節育自主，都屬於 50 年代新中國的主要社會氣象。

第四，新中國一系列的經濟制度改革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使得中國經濟社會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毛澤東急於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提出“不斷革命論”，企圖通過發動群眾和群眾運動的形式實現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跨越，違背了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60 年代以後，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文化大革命”，將革命的對象轉向國家政權機關，動員人民群眾進行無休止的革命，則更為嚴重地違背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毛澤東人口思想。

第五，節制生育是工業現代化創造的一種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黨和政府把節育當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在我國工業化建設的初期階段就及時地改變和改革國家機關的有關制度，積極支持人民群眾的避孕和節育要求。除了贊成和支持人民群眾的避孕和節育要求以外，毛澤東在 1957 年“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中，從“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出發，衍生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思想。毛澤東在講話和修改講話記錄稿其間形成的三段有關計劃生育的論述，是毛澤東逝世後我國實行計劃生育制度的依據。但是，毛澤東公開發表他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最主要的理論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卻是把那些有關計劃生育的論述全部刪去了。

毛澤東是從我國當時計劃經濟的現實出發產生計劃生育思想的。特別是在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國家工業化的許多重大項目都是以國民經濟計劃的方式實施的。所以，毛澤東由計劃經濟產生了計劃生育的想法。從歷史來考察，毛澤東由計劃經濟引發計劃生育的思想僅僅是 1956~1957 年前後一段時期的設想。雖然一直到逝世，毛澤東都未能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狹隘局限，正確認識我國經濟社會問題的根源，但是，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的修改過程中，已不再把人口衆多當作經濟困難的原因，認為“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是我們的本錢”，強調人的作用，並教育黨和政府尊重人的價值。所以，在長達 20 多年的時間裡，毛澤東既不公開發表自己有關計劃生育的論述，也從沒有準備設立自己所說的計劃生育的政府機關。

第六，如果僅考察新中國以後毛澤東對計劃生育的認識，因其概念的含義不同而有不同的情況。就節制生育和人民自主權意義上的計劃生育來說，從50年代初期到其逝世，毛澤東一直是持贊成態度的。由國家經濟計劃決定的計劃生育或根據政府計劃安排生育的計劃生育思想，則僅只是毛澤東在1956~1958年大約兩年的時間裡產生過的一種想法或理念。這一時期的想法或理念又以1957年2月27日講話到6月19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公開發表為界，分前後兩個階段。毛澤東在講話之前產生過計劃生育思想，主張要像生產計劃那樣實行生育計劃。“講話”公開發表後，雖然毛澤東還講過計劃生育，但是，已經不再強調計劃化，而明顯增強了有關論述中的人民性並特別強調人的因素作用和價值。1958年春天以後，毛澤東就再也沒有講過國家計劃意義上的計劃生育。

## 參考文獻：

- 1、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 2、梁中堂：《人口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 3、梁中堂：〈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和我國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問題的“熱點”——人口理論、發展戰略和生育政策》，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88年。
- 4、吳漢全：〈近十年來毛澤東人口思想研究綜述〉，《黨史研究與教學》，2006年第二期。
- 5、郭志儀：〈毛澤東人口思想與我國五六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四期。
- 6、楊魁孚：〈學習毛澤東人口思想〉，《人口與計劃生育》2003年第12期。